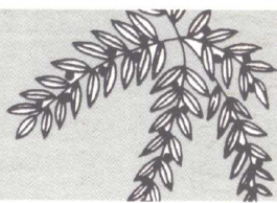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 女性作家 创作论

唐旭君/著

◎ 女性主义写作与批评不仅仅是一个美学问题，它实际上是一个妇女的命运问题。女性主义不仅是在文学与美学领域中掀起了变革与改造，而且也在整个文化与社会领域中产生了诸多的变化。

◎ 开始我想不出我被创造出来究竟是为了什么，但现在我认为，我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探究这个世界的各种秘密。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现代
女性作家
创作论

唐旭君/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现代女性作家创作论/唐旭君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7.8

ISBN 978-7-5438-4967-9

I. 中… II. 唐… III. 女作家—文学创作—文学评论—中国—现代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4347 号

责任编辑: 许久文 邓胜文

装帧设计: 周 佳

中国现代女性作家创作论

唐旭君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hnppp.com>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编: 410005)

(营销部电话: 0731-2226732)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印刷厂印刷

200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开 印张: 9.625

字数: 236000

ISBN 978-7-5438-4967-9

定价: 22.00 元

目 录

绪 论

女性主义批评与现代女性创作评价的维度	(3)
中国现代女性创作的精神路向	(23)

第一章：初醒的声音

冰心：“问题小说”与“爱的哲学”的意义	(47)
庐隐：苦闷彷徨的“五四”女儿	(64)
冯沅君：“母爱的泥泞”	(74)
苏雪林：叛逆与回归的变奏	(82)
石评梅：豪壮与幽情的和鸣	(91)
凌叔华：历久弥醇的“闺秀”风范	(100)
袁昌英：早期现代戏剧的探索者	(111)

第二章：跃动的时代

丁玲：时代洪流的面影	(121)
白薇：“爱”与“革命”的汇流	(135)
罗淑：川中苦难乡土的写实	(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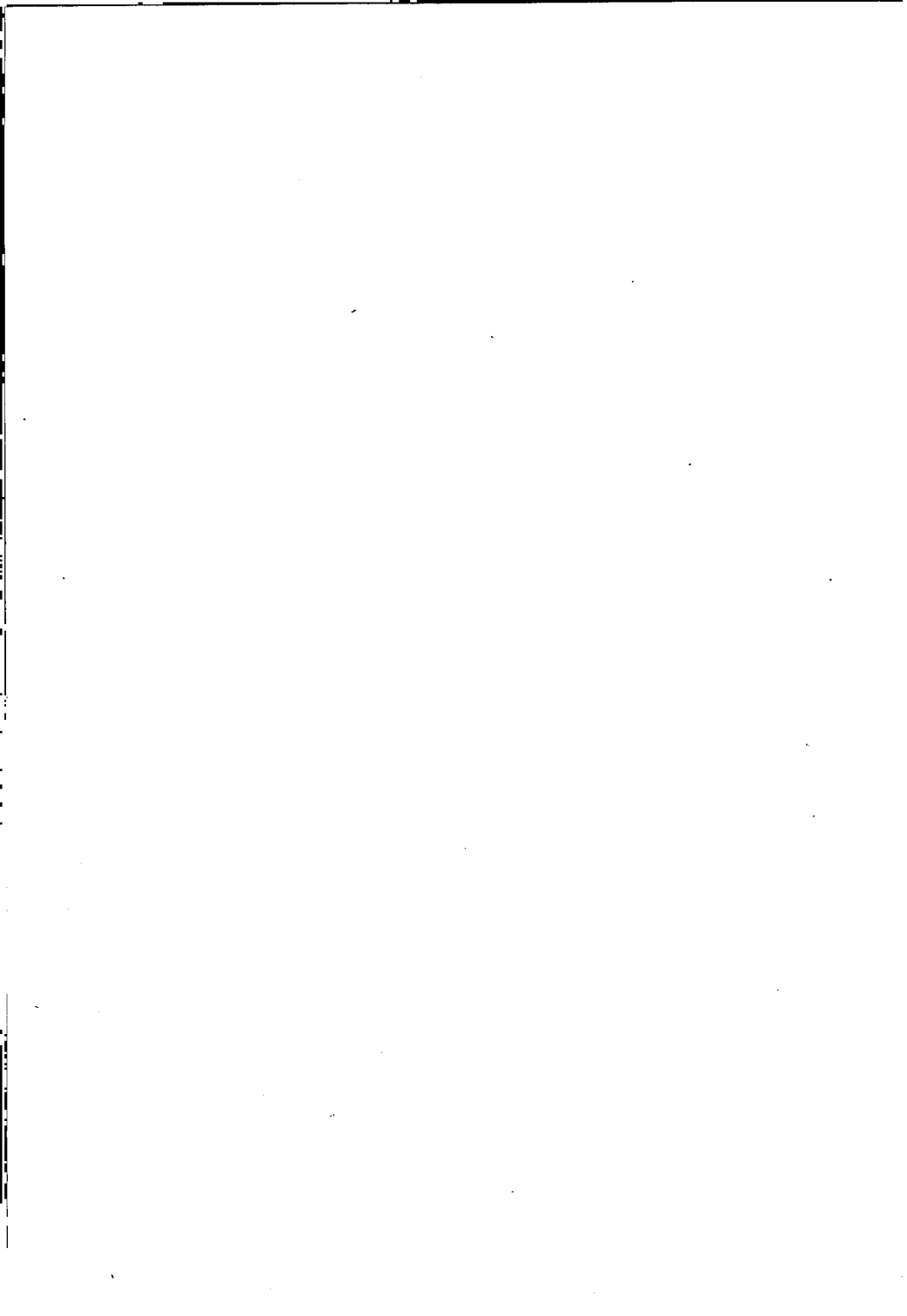
谢冰莹：别样的胸襟·····	(152)
冯铿：跃动的激情·····	(159)
沉樱：爱情背后的虚白·····	(166)
萧红：现代童年母题的成功创化·····	(176)
陆晶清：人生见闻的朴素书写·····	(188)
林徽因：“爱”与“美”的追求·····	(194)
陆小曼：浪漫纷纭中的才情与心声·····	(203)

第三章：前夜的世相

张爱玲：日常叙事的意义与价值·····	(215)
苏青：荒乱年代的平凡女性·····	(226)
白朗：抗争意志与更生的伟力·····	(235)
梅娘：封建家族的衰亡与女儿身世的凄凉·····	(243)

附录：从失语到言说：“五四”女作家婚恋小说中的女性世界 ·····	(257)
后记·····	(301)

绪 论



女性主义批评与现代女性创作评价的维度

一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内容

女性主义 (Feminism) 也称女权主义, 源自 18 世纪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Liberal feminism)。20 世纪女性主义成为显学, 并形成了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女性批评和以美国为核心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两大阵营”。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妇女解放运动之后, 法国女性主义批评逐渐成为大家所关注的中心, 其中西蒙娜·德·波伏娃、朱莉娅·克丽斯蒂娃、玛丽·达利等无疑是影响了整个世界女性主义思潮的发展与流变。至于英国和美国的女性主义的批评家也是人才辈出, 20 世纪 60 年代的作家弗吉尼亚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在 20 世纪下半期的西方批评中, 女性主义无疑是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 女权运动的存在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前提, 而女权运动又几乎是从对文学批评的研究中开始的。世界性女性文学的兴起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著名的女性主义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 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女性小说家》一书中比较准确地描述了这种发展趋势: 从文学史的亚文化群甚至发达的美国文学的具体发展流程来看, 可以发现女性文学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首先是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模仿占有统治地位的传统的模式, 使其艺术标准与社会作用的标准内在化; 其次是反对这些标准和价值, 倡导

少数派的权利和价值，并进一步要求自我权利的独立；最后是我发现，自我审视与自我建构时期。而这种女性书写历变也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女性文学批评的发展历程。与女性文学发展相类似，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过程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其重点是揭露男性文化与男性文学是如何扭曲了女性形象与女性的生存境遇，抨击传统的“阳物批评”，立足点大致在生理差异之上。第二阶段开始于70年代中期，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旗帜鲜明地用女权的视角对文学经典进行新的解释，从中见到女性在文学创作之中所具有的真正的审美特色与艺术价值。出现了如肖瓦耳特的《她们自己的文学》、吉尔伯特和格芭合作的《阁楼上的疯女人》等等影响甚大的学术理论著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是女性主义批评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一个发展阶段之中，女性主义批评开始走向综合化与多元化，不再拘泥于文学本身，而是渗透与影响到了社会与文化的多个方面。

任何一种批评都是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几个方面具体展开的。女性主义批评同样也是如此。首先来看女性主义批评的本体论。它既关涉与男性交叉重叠的部分，又在寻找和确立属于自己的“本体”。本体的双重属性和独立性已经成为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鲜明特点，并贯穿于种类繁多的女性主义批评之中。人类学家阿奎那夫妇曾经用两个圆重叠的部分代表男女文化共同的组成。但是在这个重叠的部分中，由于历史的原因男性占住了统治地位，于是女性就处于失声的地位。由于男性主体垄断了话语主权，即使偶有女性的声音，也最多只是其中的一个附属成分。那么女性除了要在这个重叠的部分恢复自我的主体地位同时还要在未曾重合的部分去寻找新的领地，阿奎那夫妇把它称为“待开垦的处女地”。而这里才是女性主义批评本体赖以存在的领域。本体的确立，明确了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任务。肖瓦尔特指

出：“女性中心批评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妇女诗学，为妇女文学的分析建立一种女性框架，发展建立在女性体验基础上的而非男性理论家和他们的方法之上的新方法。”女性主义批评的策略是对亚文化和文学部分进行女性性政治分析，主要批评父权制和大男子主义，在文化和文学系统中建立新的文学和批评理论。因此，多万诺曾经写到，女性主义批评“不仅要命名界定从未被命名、甚至曾未被看见的事物，而且也使今天和未来的妇女来看、来表达、来界定她们自己的真实”。

女性主义批评的认识论的重点在于确立性政治意识、女性主体认识与女性审美认识，并在这三种认识中展开自己的话语形式。莫伊认为，“如果女权主义不反对作为一种‘自由价值’来运用的文化批判所表现的父权制概念，它就有失去其最后一点政治可信性的危险”。批判只是手段，目的是建立女性主义批评的主体意识，女性主义认识论有一种内思嫉主义倾向。它几乎以排山倒海的力量对菲勒斯中心主义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批判，而且比同时代排斥女性的男性批评更加坚毅与彻底，可以说，她们是不遗余力的对男性中心主义与菲勒斯逻各斯主义进行了最为激烈与最为根本的批判。在具体的批评工作上，她们大量地挖掘、整理、评论文学史上被淹没的女性文本，尽管有的文学作品已经没有了与历史和时代相匹配的审美意识，但她们依然是锲而不舍，执着不辍。正因为这种倾向，让女性主义的批评呈现出一种非常鲜明的女性唯本主义。莫娥斯在《文学妇女》中曾经开宗明义地指出过“长期以来，文学是妇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的唯一的学术领域”，“仅仅在文学史上，妇女已经占据了中心地位”。“唯一”与“中心”显然是不符合女性生存与文化实际的，但是就在这种语词中已经让人们见到了她们的这种女性唯本主义。更有激进的女性主义批评者反对男性参加女性文本的批评和讨论，把男性的这种介入称之为“诡计”。

女性主义批评的方法是既有着普遍性也有着特殊性，但从某种程度上又可说它是缺少自己特有的批评方法。她所借助的大多是西方影响较大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弗洛伊德主义的精神分析、解构主义的颠覆性批判等等。20世纪是文论极其发展与盛行的阶段，他们在许多领域与具体问题上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评判，他们“对所有认为是自然的东西进行批判，从而表明被视为或称为自然的东西实际上是历史和文化的营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解构主义所共有的一种价值倾向，同时也是女性主义批评从中汲取的一种价值取向。而在女性主义批评之中真正能够体现她那独特的批评方法的是在性别分析，如性别政治、反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内思嫫主义、雌雄同体等等。在具体的实践之中又形成了几种重要的模式，如生物学模式重视女性的自然性别与此种性别带来的社会性别，并进行深入的挖掘，从中找到男女不平等的线索与性别政治及性别文化带来的对女性的歧视。侧重语言学批判的女性主义模式，则注重对文本中的语言进行具体地分析、从语言的使用中见到性别压抑与歧视。如她们分析“mother”则被视为“m, other”将母亲看作是“我的他者”。语言现时性地表现出对于女性的控制与约束。也就是说，女性是逃不出男性欲望、社会以及国家规范的控制。同时像所有后现代主义批评流派那样，女性主义批评广泛地采用解构主义批评的策略。法国一些女性主义批评家就借鉴了解构主义的那种差异至上的观点与“去中心”、“在场”、“不在场”的游戏，致力于打破两极思维，在多元化与边缘的立场之中去思考与倾听，并且努力地呈现文本自身的声音。

总而言之，女性主义批评具体遵循的原则有以下几个方面：

(1) 重估传统文化，争取妇女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家庭及性生活选择等方面具有与男性同样平等的权利与地位，积极地参与反对性别歧视的斗争，强调妇女是人类文化与

社会活动的主体与中心，并进一步改善人类文化生态与人文环境。

(2) 再写文学史，认为原来的文学史是一套父权制话语，是男尊女卑思想的体现，发掘被埋没或受冷落的女作家的作品，纠正男权传统对其进行的错误的理解，怀疑甚至重新建构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

(3) 发掘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意识，改善女性形象，研究女性特有的表现方式，诸如对文学的语言、形象、题材、情节、象征等等构成因素做女性主义的理解，认为她们应该有着不同于男性的地方，并以此支撑起自己独立的空间。

(4) 关注女性作家的创作情况，揭示她们所面临的困惑与苦难，并进一步倡导一种自觉的女性阅读，以这样的行动积极地支持女性书写的发展与延续。其目的就在于帮助女性作家积极地成为文化的创造者。

(5) 构建一套性别诗学，建立对性别差异进行比较研究的理论，揭露伪装中立或者超越性别的文学话语内在潜含的性别因子，从性别角度重新去审视人类的语言、思维特点、文类、叙述方式、阐释角度等方面的问题，努力地描述基于平等地位之上的两性角色的独特的视角界面。

女性主义批评可以说是在 20 世纪文论中极有影响的一种流派，在整个现代文化从现代走向后现代、从文化论走向批评学、从创作论走向批评论的历史洪流中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在后现代的氛围中，它从解构主义到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发展之中，也发挥了自身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意义。其实，在女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体会到其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改变女性在文学批评中的弱势地位，而是从社会性别、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对女性命运给予深度关注。可以说，女性主义写作与批评不仅仅是一个美学问题，它实际上是一个妇女的命运问题。女性

主义不仅是在文学与美学领域中掀起了变革与改造，而且也在整个文化与社会领域中产生了诸多的变化。可以说，它在某个程度上积极地促进了文化与社会领域中的某些新变。同时，女性主义批评在理论领域内也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它研究了性别政治，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女性批评的本质与特征并提出了自己可以操作的评价方式，代表了迄今为止的关于女性文学及其批评研究中最瞩目的成就。其中在话语与文本中对于男性本位意识的清算，无论在哪个程度上来讲，对于人类的生态性平衡与健康，对于整个人类文化的良性发展都有着积极的意义与价值。同时，它作为一个兴起于发达国家的批评流派，并未局限于狭隘的格局之中，而是突破了种族与国家的界限，对黑人女性文学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文学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其中，克利斯蒂娃的《中国妇女》、梅仪慈《丁玲的小说》便是她们对中国女性文学予以关注的成果。

但是与其他的批评方法一样，女性主义批评也有着自己的局限与不足。女性主义批评对于政治评价的重视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实对于任何一个文本而言，政治意识形态固然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并非是一个必然的组成部分。作为对作品的批评，我们的真正的标准与尺度应该更注重作品的审美意义与诗学价值。一首诗、一部小说我们更多的应该关注作品中所展示的人性的深度与生命本质的意义。而不仅仅是指出文本中的性别意识与性别政治。像所有的后现代批评那样，女性主义批评具有一种“泛反”的过失与错误。在反对父权社会与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同时，它对许多具有真理性的东西和具有见地与重要价值的男性批评一概骂倒，甚至怀疑一切男性书写，认为一切男人的作品都是假借男性的权杖在设置控制女性的种种陷阱与圈套。整体而言，女性主义批评文论是较为激进的，重在感受，操作有余、理论性不足，激进有余、公正与公平不足。其中除了对于性别政

治的注重外，在理论上是少有独创的地方。甚至在女性的书写上极力张扬“身体写作”，也是一种有失偏颇的倡导。女性主义者自身也越来越认识到了这些局限与不足。她们也清楚地意识到仅仅承认与寻求性别差异还是不够的；性别差异并不能代表一切，更不能代表女性写作与女性批评的成就，重要的是女性个体的发展、是女性与人类命运的关怀、是对于苦难者与悲惨者的深度关怀，只有这些才能真正建构起文学的意义与价值。

二 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介绍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思潮汹涌方法盛行的时代，就在诸多批评方法席卷整个文坛之时，女性主义也在众声喧哗中悄然登场。其实早在“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的文章与著作中就将女权作为他们所关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如鲁迅的《我之节烈观》、胡适的《贞操问题》、叶圣陶的《女子人格问题》、吴虞以其妻名义发表的《女权平议》等等文章便广泛且深入地讨论了中国妇女问题的诸多方面。当然，他们的努力是一种他性生发，但是也正是在他们所倡导的这种女权意识的潮流中，中国女性意识才得以萌芽。在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中，也出现了谢无量的《中国妇女文学史》、梁乙真的《中国妇女文学史纲》、谭正璧的《中国女性文学史话》等等著作。虽然这些专著的研究者主要是从纵向的历史维度对遮蔽在时间深处的女性书写予以揭示，多是实证地指出女性书写的历史实存，为全局地把握中国女性书写的历史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但也历史地给中国女性批评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真正的女性主义批评的传播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在传播与介绍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过程中，朱虹可以说是最早的。1981年她在《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世界文学》1981年第4期）中就介绍了带有鲜明女性主义色彩的“妇女文学”的概念，

其题为《当前美国的“妇女文学”》的序言，已经显露了鲜明的女性主义价值立场。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在序言中她再次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介绍了美国具有女权主义色彩的22位女性作家的29篇短篇小说的同时，还着重介绍了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凯特·米莱特的《性政治》等女权运动的重要著作；同时她还重点介绍了伍尔夫的《自己的一间房》、波伏娃的《第二性》等女性主义批评的经典。后来湖南文艺出版社根据台湾翻译的《第二性》在大陆公开发表了这部女性主义批评的“圣经”。虽然这个译本仅仅只是原著的第二部，并且还有许多不准确的地方，但是她崭新的视角，敏锐的观念与激进的精神的确让中国批评界为之振奋与激动。“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等等观点被许许多多的批评家们反复借鉴与引用。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国外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大量涌入，也就为中国女性主义的批评的展开形成了一种浓厚的理论的氛围。许多权威的文艺理论刊物也大量发表了女性主义批评研究与实践的文章。许多经典的女性主义理论著作也出现了译本，如1988年分别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与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1989年2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玛丽·依格尔顿选编，林树明、胡敏、陈彩霞合译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该书以论文摘要的形式汇集了1929年到1986年西方女性主义文论比较权威的观点。整书包括了“寻觅女性传统”、“妇女与文学创作”、“性别与文学类型”、“女权主义写作界定”、“妇女的写作不同吗”五个组成部分。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女权主义批评的发展轨迹与理论建设。1992年张京媛主编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书。在这本文集中，编者从“阅读与写作”、“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两个部分对西方当代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与新变进行了较为准确与全面的介绍。特别是在序言之中，

张京媛着重讨论了 Feminism 一词,主张将其译为“女权主义”,从此以后这个译法被国内学术界广泛接受。同时,林建法等人翻译的托里·莫伊的《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出版,对当时国内了解较少的法国女性主义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随着介绍与译介的进一步推动,在许多的西方文论的介绍中,女性主义也成为了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周宪等译的《当代艺术文化学》中就收录了肖瓦尔特的《走向女权主义诗学》一文。在王振蓬主编的《最新西方文论选》中也收录了肖瓦尔特的《荒原中的女权主义批评》。随着 1995 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更是促进了中国文化界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翻译与介绍。不少出版社、学术刊物纷纷推出了女性主义研究与女性写作的活动。可以说在这一个阶段,西方较为重要的女性主义理论都被介绍了进来。在中国批评界,女性主义这一批评话语体系才初步得以形成,女性主义批评中的英美流派、法国流派才被国人认知。女性主义读者接受理论,内思嫫主义、女性主义原型批评、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批评都或多或少地有所涉及。在这一时期,介绍者们更加注重女性主义批评的科学与系统的学理介绍,并不仅仅像初期那样急于向国内传递西方新的观念与理论,而是更加强调具体的操作与实践的引导借鉴。

世界妇女大会的在北京召开,让中国女性主义批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社会各界的注目与参与,女性主义的介绍与传播也就不再停留在学术研究这样一个比较狭隘与封闭的圈子之中。于是,许多文学史教科书也纷纷为女性主义写作开辟出专章。如朱栋霖、丁帆、朱晓进等人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洪子诚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等文学史教材就为女性主义创作开辟了应有的空间。在这些教材中,编者不仅把她们当作一般的文

学创作而是有意识地把她们当作女性主义文学，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女性主义文学的影响与传播。

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中国学界与文化界对女性主义的介绍与传播也呈现出多元与纵深发展的倾向。例如对生态女性主义，女性主义伦理学，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翻译与介绍也逐渐增多。其中吴春玲的《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王振逢的《女性主义数面观》（《文学评论》1995年第5期），吴小英的《科学、文化与性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黄必康翻译的美国学者苏珊·S·兰瑟的《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事声音》等等著作就比较及时地反映了西方女性主义的某些新的变化。

总而言之，这些译介的意义与价值无疑是极其重大的。首先，她向中国理论界特别是文学批评界引入了一种新的视角与方法，对于中国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与推动，对于许多文本的重新阐释与解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与操作方法。同时，对于推动中国女性各项文化活动与中国妇女事业的良性展开与中国社会生态的健康发展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三 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实践

女性主义理论的引进仅仅是一种话语的横向移植，只有现实的理论实践才能真正让这一理论在中国社会与文学的土壤上拥有自己的生命。实际上，中国学界在引进西方的这一理论的同时也开始了自己的批评实践。

开始，人们多以此为指导去指陈与揭示文化传统与社会现实中所存在的妇女问题，以引起社会的关注与重视。李小江在《当代妇女文学与职业妇女问题》中就明确指出，妇女问题的突出，促成妇女意识的觉醒。男女不平等的情况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中都是一个严酷的问题，要解决男女性别的差异是一个任重而道